

论共和国时期西藏城市发展

王 川 马正辉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0)

摘要 1951年和平解放后,西藏社会“一步越千年”,直接从农奴制进入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虽受限于历史时期独特的自然、宗教、民族区情,以及政治因素的冲击,但共和国时期西藏的城市,经过了和平解放后半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渐形成了适应西藏的城市发展之路,而且呈现出了与内地不同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关键词 共和国时期(截至2001年);西藏城市;发展轨迹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18.02.023

中图分类号 K29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18)02-163-009

西藏城市的发展,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宗教、文化、习俗等而表现出浓郁的地域特征,成为中国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城市建设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并在曲折中探索出了一条适应区情的西藏城市发展之路。如学者普布次仁所言:“在西藏,现代意义的城镇是在和平解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①。共和国时期^②的西藏城市,进入全新的发展时代和最好的发展时代,取得了较辉煌的成绩,但这一过程是曲折的:既是社会主义高原城市建设的探索,更是对西藏特殊的自然

环境、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的新时代适应。

这一时期,西藏城市与中国沿海及内地城市发展相比,虽在规模、现代化程度上还有一定差距,但其阶段性发展成绩巨大而辉煌。这既是中央政府结合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现实环境,尊重西藏历史、现实需求而转变城市建设指导方针,适时调整治藏政策的体现,更是生活于斯的各族人民(包括援藏干部、驻藏官兵等)协同奋斗的结果。这具体反映于几个时段:中央政府和解放西藏至民主改革前(1951-1959年)、民主改革至十一届三中

收稿日期:2018-04-09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20世纪中叶以来西藏城市人居环境发展变迁研究”子课题“20世纪以来西藏政治、文化与城市人居环境发展变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6ZDA135

第一作者简介:王川,男,汉族,四川乐山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学术史。

①西藏和平解放后(1951年)至前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2010年)期间,党、国家的西藏政策已经效果明显,西藏社会与解放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对比性变化;此外,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至今,西藏社会发展又有了区别于此前的变化。因此,若进行长时段综合性研究,由于时间跨度太大,且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的西藏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阶段性发展效果尚未完全呈现,故限于篇幅,本文暂不作叙述,仅以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前,西藏城市面貌变化、中央和西藏地方相关政策的梳理研究为主。至于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会以后西藏城市的发展变化,拟另文研究。

全会(1959-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前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前后(1978至2001年)。^①在这几个阶段中,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社会发展的规划,虽然在一定时期出现偏差,如“文革”时的短暂停顿,但党中央坚持客观务实地建设新西藏,推动了新西藏城市的逐渐发展。

西藏城市史的研究,方兴未艾^②。西藏城市史研究如同其他城市史研究一般,在21世纪前后有了一个较大突破,相关学术成果与观点也由平面化勾勒向立体化构建转变。对共和国时期西藏城市发展的探析既是对西藏半个世纪以来地区面貌阶段性特征的回顾,更是对党和国家治藏方略的认识。本文拟就此作一分析,以期窥探西藏城市发展的内外影响因素及未来城市发展方向。

一、共和国时期西藏城市阶段性发展轨迹

1959年民主改革至1965年自治区政府成立以来,西藏社会面貌与其和平解放前形成了鲜明对比。共和国时期的西藏城市,根据发展水平可划分为较发达城市、欠发达城市两大类型。^③

(一)较发达城市

1.拉萨

作为历史时期西藏主要政治文化中心之一^[2],拉萨的发展,有西藏其它城市无法比拟的政治、宗教、文化优势,一直走在整个西藏地区前列,拥有西藏首城之地位。1951年,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拉萨发展与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1951年和平解放至1959年民主改革前,为和平建设西藏,争取最大多数西藏上层,党中央虽对

拉萨有一定建设,但秉承“慎重稳进”方针,仅在拉萨城内进行了有限的基础设施建设。1959年民主改革开始后,西藏城市发展才有了早期规划。1964年,拉萨“集中突击打了一场城市建设的‘歼灭战’”,不仅修建了宇拓路、康昂东路、娘热南路、金珠东路、朵森格南路、北京西路,而且敷设了10万多平方米的柏油路面。这些新道路的修建,使拉萨市中心区的道路骨架初步形成”。^[3]“文革”时期,拉萨发展短暂停缓。“文革”后,拉萨的建设发展真正进入快车道。1979年自治区建委同拉萨市成立规划办公室,完成拉萨市区总体规划,并于1983年获国务院批准,“拉萨市的城市建设进入了科学、规范的轨道”^[4]。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后,援藏政策成为中央的一项长期规划,并全面落实到各援藏省、市,“1987年到1991年的4年间,主要按‘抢救、维修、保护、新建’的八字原则进行了一系列建设”^[5],为现今拉萨城市规划了蓝图。随着1984年确定的43项援藏工程及1994年确定的62项援藏工程的实施,西藏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探索“输血”向“造血”转变的发展阶段,拉萨也愈来愈呈现国际化旅游城市健康发展状态。

2.日喀则

日喀则作为藏传佛教两支主要活佛系统之班禅大师驻锡地,是西藏第二大城市。共和国时期,因其重要的历史影响及背临南亚,中国对外交流的西南门户之一的战略区位,其城市发展逐渐突破了宗教与地域限制,成为西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展示窗口。

1959年5月,设日喀则县,1986年12月更名日喀则市。^[6]日喀则城市建设也在此后开启了全新的

①王松磊等人时段划分观点大致相同,但将最后研究时段拓宽至当下。王松磊,杨剑萍,王娜.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城镇化道路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76—183.

②中国西藏城市史研究虽不及中国内地及东南沿海城市那般全面与深入,但也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产生了一批论著:如建国后由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撰了西藏七大地地区的地方志与自治区志。西藏城市史论著如李佩帧.拉萨城市演变与城市规划[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何一民.世界屋脊上的城市:西藏城市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期刊论文,既有综合考察整个西藏历史时期城市发展史,也有选取某一时段研究者,还有着眼城市涉及其它研究点者等。

③此划分为笔者浅见。“较发达”与“欠发达”仅就西藏自治区内部城市间的比较,其中较发达西藏城市为拉萨、日喀则、昌都、林芝,欠发达西藏城市为山南、那曲、阿里。

时代。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动脉,也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区划线。1975年至1984年,日喀则地区修成了扎得东路、扎得西路、解放南路、北京南路、北京北路、解放中路、贡觉林路、解放北路8条公路。^[7]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日喀则的城市发展速度也随之变快。地区政府在中央一系列指导方针下开始了对日喀则的城市建设规划。“1978年初,在中共日喀则地委、日喀则地区的领导下,成立日喀则城市规划小组,制定《日喀则城市规划及其发展前景的初步设想》。1980年,进行补充、完善,形成《日喀则城市总体规划的初步设想草案》。1985年完成《城市总体及其专业规划方案》。1986年,国家批准县改市。”^[8]此过程中日喀则也逐渐将城市定位为区域中心、交通中心、旅游边贸中心、高原名城。

3.昌都

历史时期藏东门户昌都与内地交流甚广,历来是川藏之间的交通要道,是藏东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9]西藏全面和平解放前,因处于藏区与内地的汇合处,人民解放军与西藏顽固上层统治阶级对峙于此,昌都成为西藏地方窥测新生政权的前沿,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对藏民族政策的第一站和撬动西藏顽固反动集团的关节点。

因西藏地方拒绝谈判和平解放,为“以战促和”,中央军委下达发动昌都战役的政治命令,1950年昌都解放。1951年1月成立地区解委会,直属于中央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1956年9月,昌都地区正式划归自治区筹委会,1965年隶属西藏至今。^[10]

昌都行政建置走在了西藏各地区前列,城建管理亦如此。1952年6月前,昌都城建工作由地区解委会农牧处主管,次年6月成立地区“解委会建设处”,1965年3月改称“建设管理局”。“文革”期间,城建工作相对停顿,交通与建设管理局合并称为“地区交通建设管理局”,1975年8月改称“交通

局”,1977年成立建筑建设科,城建部门也在名称、部门、功能上逐渐完善。1996年,地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正式成立。^[11]“解放前夕,昌都镇仅有4000人口,占地面积0.3平方千米,总建筑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12]“从1952年川藏公路通车后,昌都的城市人口逐渐增多,汉族亦随之有所增加。”^[13]“到2000年底,仅昌都城关镇人口达5万人,居住面积也有了跨越式的增长。”^[14]1999年后,昌都城镇规划建设发展才进入规范化轨道,城区扩大为7.6平方千米。^①

4.林芝

林芝市地处西藏自治区东南部,东连昌都北接那曲,西通拉萨,并与山南相守于西南。是川滇线入藏必经之地,且处于国境线上,毗邻印度、缅甸等,地理、战略位置尤为重要。进入共和国时期,“昌都战役后,解放军战士进入波密开展工作,波密倾多、曲、易贡3宗解放。1951年3月,中共波密工委成立。11月,成立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波密第二办事处。”^[15]此后,现今林芝下辖部分地区分别经历了昌都管辖期和山南管辖期,直至1960年2月成立“林芝地区专员公署”开始,林芝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行政区划而存在。1964年5月,撤销林芝专署,波密县划归昌都专区,林芝、米林、墨脱、工布江达4县划归拉萨市,嘉黎县划归那曲专区,撤销雪巴县。^[16]为促进林芝地区社会经济发展,1986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成立林芝地区,辖7县,林芝城市建设进入稳定发展期。

1966年,财政部分配给西藏小“三线”建设预算846万元,同年追加基本建设投资预算872万元,小“三线”建设在西藏全面铺开,先后建起了八一、扎木、吉塘、瓦窖、俄洛等小城镇,促进了西藏东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17]林芝地区恢复成立的同年,林芝计划经济委员会成立,下设城乡建设保护局。1996年成立地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工程质量监督站、城乡规划建设设计院等城建规划部门,林芝城建进入科学化、有序化发展模式,真正从

①1999年4月20日,地区城建局发出《关于执行〈西藏自治区城镇建设项目规划管理实施“一书两证”制度规定〉的通知》(“一书两证”为: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西藏昌都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昌都地区志(上)[M].474.)

自然环境、现代化城市体验两个方面建设“西藏江南”。

(二)欠发达城市

1.山南

山南是藏区自然条件较优越的地区,曾在历史时期作为西藏区域性政治统治中心,有深厚的城市发展积淀。^[18]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后,山南地区也随之逐渐发展,如行政区划调整^[19]。1965年自治区成立后,山南建立了人民政府,开始部分城镇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的制定,直到1974年山南地区城市规划工作才开始启动^[20]。

以山南地区中心泽当镇为例。民主改革时,泽当镇有600多人,248户人家,镇域面积不到0.2平方千米。1976年、1984年,泽当镇进行了第一、二次城镇总体规划,“对该镇的水文、地质、气象、经济、社会、历史等资料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总体规划。1987年12月14日,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实施。”^[21]此后泽当镇城市化进入了一个健康有序的发展阶段。至2000年末,泽当镇已建立至拉萨、错那、曲松、措美、桑日、琼结等地的公路网。诸项城市基本设施齐全。“地直单位和军分区均设在镇区内,文化、教育卫生条件较好。”^[22]这直接得益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对城镇基本建设的大规模投资。

2.那曲与阿里

相较于西藏其它五个城市,那曲和阿里因其高海拔、低含氧量、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现代化城市建设之路异常艰辛,也因此成为西藏现代化城市中的短板。

西藏“北大门”那曲,历来是西藏与祖国内地交往的要冲。民主改革前,那曲长期处于封闭单一、生产力低下状态,几乎无城镇基础建设。民主改革后,那曲社会面貌有了巨大变化,现代化城市建设从无到有,基础设施逐步健全。

“和平解放时,那曲镇虽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羌基’(藏北总管)所在地,但仅是一个不足3000人的草原小镇,一条狭窄、污秽的街道环绕藏北一地的名寺——孝登寺,沿街两旁是阴暗、破旧的土房和透风漏雨的帐篷。1954年青藏公路通车那曲,

1960年那曲行署建立,加快了那曲镇建设的步伐。”^[23]自解放之日起至改革开放前,那曲城市建设与发展一直较慢。

“1986年,开始编制那曲镇第一次总体规划,由于起点低,再加上计划经济的制约,在规划实施几年后就与那曲镇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发生较大的偏离。1998年,在辽宁省规划设计院的援助下,对《那曲地区那曲镇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编,明确‘以那曲镇为中心,以县城所在地为骨架,以人口相对集中,交通便利、发展潜力较大的城镇为基础’的城镇发展总体思路。1999年10月,此规划获得自治区政府审议通过。”^[24]此后那曲城市化进程开始稳步推进,以中心区域那曲镇为例:“到一九八五年那曲镇已成为一个拥有1.2万多人、占地面积8.5平方千米、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的草原城镇。”^[25]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机构的成立,逐渐形成一些街道。上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那曲镇已经建成色尼路、文化路、羌塘路、浙江路、辽宁路、拉萨路、超丹路等城市公路,基本形成了“四纵三横”的市政道路交通网。^[26]

阿里地处祖国西南边区,被称为“世界屋脊之屋脊”“世界第三极”“生命之禁区”,“西藏是全国的不发达地区,阿里则是西藏的不发达地区”。^[27]1950年,为贯彻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独立骑兵师先遣队和平解放阿里。^[28]1956年8月,阿里办事处成立。1960年1月设立阿里专区,9月1日,经中共西藏工委批准,成立阿里专区专员公署,正式建立阿里人民政权。1970年,阿里专区更名为阿里地区。^[29]

1952年中共阿里分工委成立,入藏解放军、机关开始在昆萨和噶大克修建政府机关和住宿用房,阿里现代化城市建设开始萌芽。以现今阿里地区政府驻地狮泉河镇为例:1965年时,狮泉河镇属灌木丛带,除游牧群众外,无居民居住。1965年7月23日,国务院批准阿里专区所在地从噶尔县昆萨迁至狮泉河镇。1967年完工,完成阿里地直机关1700平方米的办公、住房修建。1969年至1979年国家再次投资对狮泉河镇进行扩建。至70年代末,城区面积约0.25平方千米。^[30]1985年阿里地区

行署委托徐州市城乡规划管理处编制完成狮泉河镇建设总体规划(1986年-2000年)明确规划范围,以及南向的城镇发展方向。自70年代起,阿里城镇道路交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至2000年已修或在修11条街道,极大地促进了阿里现代化城市的发展。

二、西藏地方城市建设指导方针与规划理念变迁

西藏现代城市化程度的高低与城市辐射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整个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国东、中、西部城市就数量、城市规模、现代城市化水平等横向比较,差异性明显;就纵向比较而言,东部与中部城市化积淀、城市化理念、居民对现代城市化的接受程度也与西部存在较大差异。整个西部,西藏城市化进程又是最缓慢而曲折的,阶段性特征相对明显。

(一)中央政府和解放西藏至民主改革前(1951-1959年)

近代至民国,国力日益衰颓,国际势力逐渐渗入^[31],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渐有疏远迹象,中央政府对藏管辖的有效性受到挑战。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与西藏地方签订《十七条协议》,充分考虑了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宗教、民族、国际残余敌对势力影响等区情,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西藏不随内地在1956年开始民主改革,即“六年不改”的战略构想。但1959年西藏叛乱,打乱了中央治藏既有方针,加快了西藏民主化进程,也客观上促使西藏社会主动或被动地加速剥除封建农奴制残留。

为争取西藏僧侣、贵族上层和普通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可,打消疑虑和偏见,中央政府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在西藏开展新政权的建立工作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民族地区适应性尝试。七个地市均仅为入藏官兵以及相关办公机关单位修建了必需的、较为简易的办公和住宿设施,以及必需的一些生活、生产配套设施性建筑,不曾明显打破西藏已有的城镇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康藏公路”“青藏公路”修筑

通车在西藏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在这一时期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康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分别于1950年和1951年开始勘探修筑,1954年12月25日合龙于拉萨。此后不仅内地物资与援藏干部可通过此二线顺利入藏,也方便了广大藏胞走出藏地,增进了西藏地区与内地的交流。到90年代,“三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由于川藏、青藏两大公路干线的通车及之后西藏公路交通网的形成,大大促进了两条公路沿线的发展。在过去的深山野谷中出现了不少新兴的城镇。”^[32]

(二)民主改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1959-1978年)

这一时期,西藏城市发展开始逐渐消除来自封建僧俗旧贵族和西藏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落后、狭隘思想的影响,抛开羁绊。中央为西藏制定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对未叛乱的农奴主、寺庙以“赎买”政策给予生活出路,鼓励其继续贡献于西藏社会发展,确保西藏稳定。同时,“由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在城镇民主改革中没有资本家阶级,大大调动了城市工商业个体户的积极性。”^[33]这对西藏城市化建设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1956年5月6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决议中明确指出:“为使西藏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并有利于各项建设事业的进行,在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后内地物质供应西藏的情况下,应该研究并采取适当措施,争取物价下降。”^[34]这一稳步发展西藏社会经济与城市的构想在1959年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叛乱平息后,随着民主化改革而有了一定发展。中央政府平息叛乱后即开始对西藏牧区、寺庙、城镇和边境地区进行民主改革。

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随着拉萨市人民政府的成立及各地区专员行政公署的建立,城镇的基础设施、住宅建设等有了较快的发展,城镇的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现代城镇的雏形在西藏出现。^[35-36]西藏各地区城市建设开始步入一个稳定而相对持续的上升期。这一时期,“西藏开始了有计划的城市建设,城市发展正式进入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形成第三次建设高潮,住宅建设有较快发展,特别是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前,拉萨市和

几个重镇的基础设施水平进一步提升,在附近的河流两岸修筑了防洪设施。”^[37]

在民主改革前,西藏城镇工商业很不发达。“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城镇除了三大领主直接控制的少数大商店和印度、尼泊尔籍个人经营的一些商店外,只有少量小商贩和手工业者。”^[38]民主改革期间,采取了如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加强城乡物质交流、恢复拉萨冲赛康等自由市场、安置就业等城市管理措施,使得西藏城市发展有了新的社会秩序,城市的民主改革使拉萨、日喀则、昌都、江孜出现了新的生机并取得了初步繁荣。^[39]

1966年“文革”开始后,西藏城镇化建设放缓,进入一种非正常发展阶段。但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区情,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对“文革”中“文攻武斗”的制约,相较于内地而言,西藏“文革”时间短、影响范围小、运动规模在可控范围内,大量历史文化建筑得以保存,这为以后西藏诸多城市走旅游发展道路保存了资源。宗教活动受到较大冲击,“文革”后相对萎缩,客观上为后来西藏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建设剥除了一些宗教限制。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至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时期(1978至2001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西藏的城市建设从整体规划、全国援藏人才与物资支撑、国家政策支持、西藏社会发展、西藏人才培养、城市功能转变的现实需求等方面进入一个健康而持续的阶段。此阶段,各级政府城建相关单位逐渐健全,第二、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大批援藏干部入藏,大型援藏工程上马,形成了“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布局。

1980年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指出:西藏新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的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40]这是西藏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

化,为开始西藏城市规划与建设,扫除了“文革”的禁锢。

1984年3月,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组织9省市帮助西藏建设43项工程,组织援藏干部有计划援藏的部署。“这次会议为西藏制定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为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41]在中央做出短期内为西藏建设43项工程项目的决定后,各省市积极组织相关单位与人员开始落实相关工程项目。“最终,43项工程完成总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包括能源、交通、建材、饲料加工、商业、教育、文体、卫生、市政和旅游设施10方面,总投资4.8亿元。除停建1项,缓建2项外,其他项目不到两年时间全部建成并交付使用。这对于当时仅有198万人口的西藏来说,建设规模之大、施工时间之短、现代化程度之高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国内也不多见。”^[42]这一切直接推动西藏现代城市化有了质的飞跃。城市功能逐渐完善,城市总体布局基本形成。

1994年7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之际,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在总结此前西藏社会发展经验与问题的同时,确定了投资23.8亿元^[43],为西藏安排62项建设工程的规划,此为党和国家对西藏社会发展的又一次大规模“输血”和尝试性“造血”。2001年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总结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的经验,为促进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决定“加大对西藏地区特殊政策支持、延长对口援藏时间,扩大援藏范围、实行财政补贴等要求。可以说中央对西藏的特殊照顾政策越来越多样化,支持力度也是越来越大。”^[44]

就前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而言,尤以第三、四次对西藏社会、对西藏城市发展注入巨大的外向推动力与内向牵引力最为引人注目。“20世纪末,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部署,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中心,必然成为西部现代化的重点。”^[45]而西藏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蕴藏巨大的自然资源潜力和城市开发空间,必定会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西藏城市发展进入一个多样化与立体化的灵活内外双向作用、“输血”与“造血”并存向

“造血”为主的阶段转变。

三、西藏城市发展总体特征与未来发展方向

(一)西藏城市发展总体特征

有识者指出:“西藏城市发展的重要特点就是‘高原、民族、宗教’”。^[46]西藏历史上,城市中心、城市面貌等随着西藏地方政权嬗变,有较大变化。地方区域中心在不同时期,为适应西藏地方政权的统治需要而几度变化,或为体现一方割据势力,呈现地方区域多中心格局。如统一时期的拉萨、日喀则、山南泽当等地,割据时期的拉萨、曲松、扎不让等地。^[47]在自然环境、政治区划的作用下中心城市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元素,并向周围产生辐射作用。清代以降,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家独大,宗教成为影响西藏城市发展进程的最大力量,也成为其与祖国内地城市最显著的区别之一。一切来自外部的尝试性改变和内部的自我调整必须考虑这一特殊的区域特征。

共和国时期,党和国家考虑到西藏独特的历史,对西藏城市规划在不同时期做出不同的指示。《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中央从西藏历史与实际出发,采取“慎重稳进”的指导方针,并于1956提出了“六年不改”的战略构想,仅建了部分基础性生产生活设施,此时城市建设与发展还未有相应的配套设施。

1959年平叛后,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同年5月7日,毛主席指示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你们主张边平叛、边改革,这很好。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希望你们多做工作,搞好民主改革,早日把西藏变成繁荣昌盛的新西藏。”^[48]西藏开始了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现代城市化建设也被提上日程,西藏各地开始独立设置城建规划部门,制定城市建设与规划方案。期间虽然经历“文革”冲击,西藏城市建设有所放缓甚至停滞,但由于中央和西藏地方的积极引导与控制,西藏地区的“文革”影响较内地相对较小。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西藏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仍然处于一个稳步推进的发展模式。此时期,西藏完成民主改

革,建立自治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西藏地区百年历史上成就最辉煌的时期。^[49]

自1980年至2001年,由中央组织,专为西藏社会发展谋未来、绘蓝图而召开4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了“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西藏社会发 展布局,依次议定了全国诸多省市“分区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模式的100多项援藏工程,并且党中央和各援助省市和单位逐次增加援藏资金,援藏方式亦向多元化与可持续性转变。专为一个地区而召开全国性会议,西藏是首例,西藏在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有鉴于此,中央近年来将此种模式也应用于新疆。

西藏和平解放后较祖国内地,其城市面貌、发展水平等在各个时期均有较大差距,但这是新生政权在民族地区的一种适应性探索的实践与磨合。客观地就西藏解放前后的变化而言,可谓日新月异。

(二)西藏城市未来发展方向

从一定程度上说,西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步与发展。“西藏在本世纪中叶尚处于前近代社会,一直保持其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社会体现,近现代的差距导致了西藏的生产力水平还处于近代阶段。导致了西藏与我国其它省份的较大差距。”^[50]西藏城市建设在共和国时期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在这辉煌的背后,凝聚着党和国家的期盼,凝结着援藏各省份的后劲支援,更凝聚着广大援藏干部的心血和全体西藏人民的坚韧奋进,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决心和勇气。

随着西藏诸多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西藏城市发展需要更为高瞻远瞩的长远规划和大局性、全球性视野。西藏诸多城市因地制宜,利用所在地区的旅游资源,旅游业发展迅猛。和平解放后至2010年,西藏已经逐渐从一个相对落后、闭塞的高原地域发展成为拥有重要的服务于边防、初具现代化城市特征的城市群。但与内地相比,“西藏城市在城市化水平、城市化背景、人口流动和非农化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51]溯根究源,在于人力资源短缺、内部自我“造血”能力不足,自我潜力发掘还有待加强。

第一,西藏城市发展需要增强内部动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央、西藏地方、援藏各省市、各单位协同努力,将一个还徘徊在封建农奴制体系之下的西藏社会牵引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城市面貌从交通、信息、工业、商业、建筑数量与规模方面紧跟时代,基本设施已然具备;城市面积逐渐以“一条街,一个镇”的体量向多片区、多中心方向发展;城市居民素质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稳步提高;诸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也在逐渐增强。长期以来,尤其是第三、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共同建设“新西藏”,大规模、阶段性扩大对藏“输血”,但西藏内部“造血”体系还未健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限于独特的地理、历史环境,西藏的长期发展需要中央持之以恒的坚强领导,需要各兄弟省市及单位援助,但西藏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须从内部发力,利用丰富的资源、优渥的政策、相对便利的交通联通对内地、对东南亚的物资交流与合作。

第二,西藏城市发展需要向祖国内地取经,向国际社会问道,在此过程中也应该保持特有的民族特色。考虑西藏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对未来生活的期望,避免“千城一面”的发展模式。“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西藏社会发展模式与生活习惯是其千百年来经验与习惯积淀,是西藏人民的自我选择。面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西藏如何成为其中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应成为西藏未来发展的长远目标和规划方向。是紧随全国与世界潮流,大规模实施“辞旧迎新”追赶潮流,对城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还是在肯定本区长期以来历史底蕴的基础上,有创新,有保留地进行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党和国家、西藏人民面前的重大抉择。随着进藏公路、铁路、航线的开通和沿途服务条件逐步完善,西藏抓住了发展第三产业的历史机遇,开发了多条入藏旅游路线,提出了“天上西藏,大美于行”的口号。在新时期,面对新机遇,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区位以及神秘的宗教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从这个角度来看,西藏正在进行的和未来长期需要坚持的不仅在于追求城市现代化,更需协调处理好与保护本区历史底蕴和

丰富自然景观的关系。^[52]既要勇于创新,探索西藏发展之路,也要批判性地对待西藏历史建筑文化与建筑方式。

第三,西藏的城市发展应逐步构建均衡区内几大城市圈、促进城乡一体化可持续、由再生动力机制调配的“一极多辐射中心”长远发展格局。一个地区的发展应尽量考虑到在区域范围内,协调各城市综合发展,为城市的长远发展留有余地。西藏城市建设与规划是与国家一同发展,逐渐建立且完善的。“新西藏”建设是一个时代诉求,更是一个历史命题。西藏城市化建设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完善的,在尊重历史时期建设的基础上,也应该为以后的西藏建设留有空间和时间,不能一味地追求速度与数量,否则,城市建设将会成为机械化作业。在西藏城市化进程中,应注重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真正形成“以城促乡,城乡并举”的发展路径。西藏地广人稀,更多的是农村,大多数城市目前仍是体量小、发展缓慢。西藏城市的发展需要支撑起发展的各项物资支撑,完全依靠内地输入固然可以解决阶段性问题,但西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农村的支持,农村的进步也需要城市带动。因此,西藏城市未来的发展,应重视“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 [1] 普布次仁.城市化与西藏城镇发展当议[J].中国藏学,1995(3):140-144.
- [2][18][47] 魏伟,李博寻,焦永利.藏区中心城市的演变及格局研究[J].建筑学报,2007(7):80-84.
- [3][4][5] 李侃帧.拉萨城市演变与城市规划[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15-17,22,22.
- [6][7][8]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日喀则地区志(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7):99,99-100,920.
- [9][13] 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190,186.
- [10][11][14] 西藏昌都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昌都地区志(上)[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17,471-472,473.
- [12][21][23][25]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西

- 藏(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4:292,287-288,291-292,292.
- [15][16] 林芝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林芝地区志[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3,4.
- [17]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藏自治区志·城乡建设志[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2):124.
- [19][20][22] 山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南地区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9.4:53-54,719,57.
- [24][26]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那曲地区志(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739-740,741.
- [27] 孙红.阿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初探[J].西藏研究,1986(2):23-28.
- [28][29][30]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阿里地区志(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序11-12,703.
- [31] 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10.232
- [32]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西藏(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89,94,112.
- [33][34][38][39][40][41][42][43][44][49] 白玛朗杰,孙勇,仲布·次仁多杰.西藏百年史研究(下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45,145,203,162,162,316,333,347,411,413,导论5.
- [35] 普布次仁.城市化与西藏城市镇发展刍议[J].中国藏学,1995(3).
- [36][37] 王一丁.西藏城市发展史考略[J].西藏研究,2009(5):41-50.
- [45][46] 何一民.世界屋脊上的城市: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序言3.
- [48] 阿沛·阿旺晋美,等.见证西藏.北京:中国藏学,2005.8:47.
- [50] 吕涛.自然·社会·城市-浅议西藏城市发展[J].城市规划,1996(3):27-29.
- [51] 李涛.西藏与内地沿海城市化比较研究[J].民族研究,1999(1):31-43.
- [52] 徐宗威.西藏城市特色问题[J].城乡建设,2002(11):43-44.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in Tibet Since 1949

WANG Chuan MA Zheng-hui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0)

Abstract: Afte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in 1951, the Tibetan society changed directly from the one with serfdom into the one with socialist system, and Tibet'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onstruction also entered into a new historical period. Tibet had been constrained by some of its natural, religious and regional conditions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factors in the past, but since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Tibet has gradually found a suitable road for its urban development which presents some different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with that of the cities in inland in different stages.

Key words: from 1949 to 2010; the cities in Tibet;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周晓艳]